



索尔·贝娄 访谈录

[罗马尼亚] 诺曼·马内阿 著

邵文实 译

Saul Bellow × Norman Manea

在我离去之前
结清我的账目

Saul Bellow: Settling My Accounts Before I Go Away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Saul Bellow: Setting My Accounts Before I Go Away

索尔·贝娄访谈录

「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 | 著

邵文实 | 译

马内阿作品 | 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索尔·贝娄访谈录：在我离去之前，结清我的账目 / (罗) 马内阿著；邵文实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7

书名原文：Saul Bellow: settling my accounts before I go away, a words & images interview

ISBN 978-7-5086-5018-0

I. ①索… II. ①马… ②邵… III. ①贝娄, S. (1915 ~ 2005) - 访问记 IV. ①K 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6423 号

Saul Bellow: Settling My Accounts Before I Go Away, A Words & Images Interview by Norman Manea

Copyright © 2013, Words & Images

Words & Images, 19 Derech Eretz Street, Gadera 7047119 Israel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索尔·贝娄访谈录：在我离去之前，结清我的账目

著 者：[罗] 诺曼·马内阿

译 者：邵文实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 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mm×1240mm 1/32 印 张：5 字 数：83 千字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4-7627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5018-0/K·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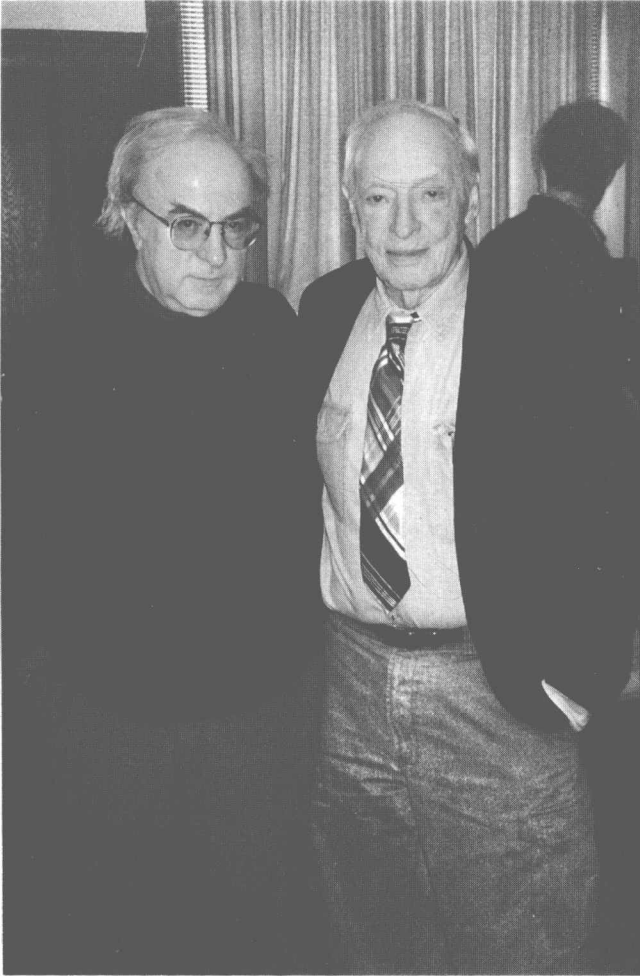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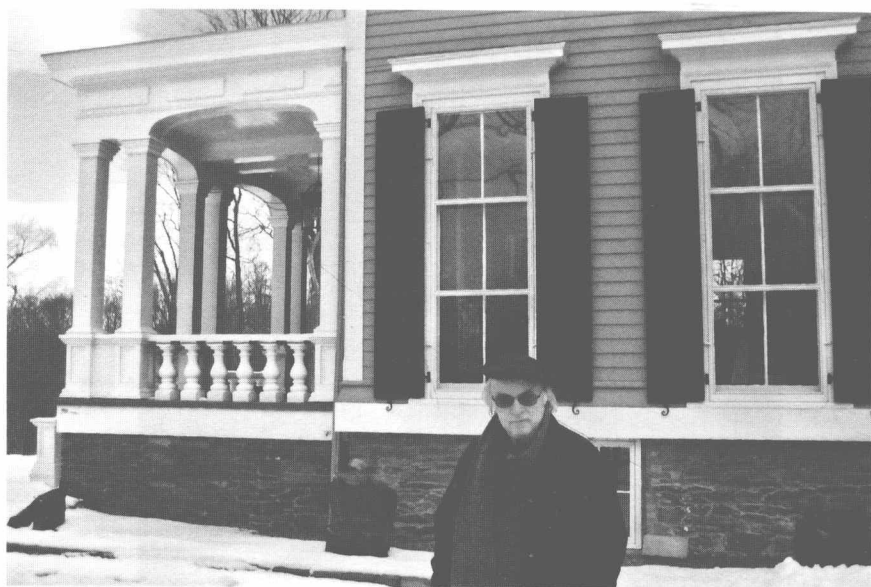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诺曼·马内阿（左）与索尔·贝娄（右）



索尔·贝娄的家



索尔·贝娄（右）、塞拉·马内阿和诺曼·马内阿（左）
贝娄家，1998年夏



诺曼·马内阿、贾尼斯和罗西·索尔·贝娄
纽约，莲花俱乐部，2000年8月



塞拉·马内阿（右一）、贾尼斯·贝娄（右二）、索尔·贝娄（左二）和诺曼·马内阿（左一）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斯坦因伯格纪念会，1999年

目 录

序 有关索尔·贝娄的一些思考	1
第一部分	
“别再像个移民那样行事”	21
第二部分	
“在写作中，我的工作是我自己”	63
第三部分	
“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快乐地死去”	95
第四部分	
“犹太人与其戏谑之间没有前途”	135
文字与图像：耶路撒冷文学计划	147

序 有关索尔·贝娄的一些思考

诺曼·马内阿

—

通常，小说会促使读者相信，它们在被理解为对有争议的热门话题的反应时可能是最好的。访谈者将虚构事件“翻译”为他们的“真实生活”基础，并通过辨识它们基于其上的实际“模型”来揭露小说人物。数年以前，当索尔·贝娄的最后一部小说《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问世时，它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我的祖国罗马尼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让我深感震惊；在罗马尼亚，评论家们没完没了地空谈着如“政治正确性”和“大屠杀产业”一类的问题，仿佛贝娄写这部小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此类事情上为我们提供指导似的。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些评论家们还信誓旦旦地推测着小说人物的现实对应者，好像贝

娄的感情和意图完全不值一提似的。

罗马尼亚人当然有理由对贝娄感兴趣，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个非常伟大的作家。《系主任的十二月》（*The Dean's December*）部分以罗马尼亚为背景，尽管《拉维尔斯坦》与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事件的关联相对较少，但其边缘人物拉杜·格里莱斯库（Radu Griesescu）有点儿像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且小说在其他罗马尼亚人物中顺带地间接提及了E. M. 齐奥朗（E. M. Cioran）。注意到这些元素的美国读者也许不会关注它们，但在罗马尼亚，同时也在散居于国外的罗马尼亚人中，这些东西却似乎是那些小说的最重要的方面。

毫无疑问，在美国，《拉维尔斯坦》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纪实小说”（Roman à clef）被谈论。争论聚焦于贝娄与朋友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关系，后者显然是拉维尔斯坦本人的原型。难道贝娄的小说中所描绘的人物事实上是精英理论家和尖酸刻薄的文化批评者？小说中所描写的脆弱和轻佻是编造出来的，还是它们本就属于布鲁姆本人？难道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是对长期友谊的“背叛”？这些是许多美国评论家对小说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些美国评论家以自己的方式，着迷于贝娄的动机和小说的政治性，这与罗马尼亚的读者并无二致。媒体寻找丑闻和秘密的倾向是贝娄心知肚明的事情，他无疑在由《拉维尔斯坦》和前期小说所激起的反应中认出了所有

熟悉的信号。

辛西娅·欧芝克 (Cynthia Ozick) 在写作时^[1] 为此倾向提供了必要的纠正：“当变成小说时，作者的生活就成了无名者的事情。一部小说，即使它是自传性的，也不是一部自传。假如作家本人放出话来说，某某人物实际上是真实生活中的某某人，读者依旧有义务——小说的‘入魅义务’——捂住耳朵，充耳不闻……小说是存于地下的，而非显露在地面上的。或者，正如道家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原物虽逝，其幻影，即那强大的奇异之存在，却与世长存。”这番话被赋予了典型的良好判断力之特征，即使我们不是总有可能遵循“入魅义务”的条款，但我们无疑能够明白，对于作为读者的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要倾力去这样做，即使仅仅是为了阻止我们不耽迷于对流言蜚语以及在主流文学报刊中受到推动的过于简单化的偏好。

当然，还有其他的理由让人警惕那种或多或少会轻易地从虚构转向“真实”的阅读。也许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让步于此类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会生吞活剥有关所谓的历史记录的易于误解的信息，忽略构成小说文本之基本特征的矛盾信号和歧义性。在《拉维尔斯坦》中，贝娄纳入了可支持拉杜与伊利亚德之间的关联的日期和事实，但他也提供了其他与那一推测性的关联相抵触的信息。小说中对拉杜提出的控诉通常不是来自叙述者，即齐克 (Chick)，

[1] 在《脑中的喧嚣》(The Din in the Head) (Mariner Books, 2007) 中。

而是来自他的妻子罗莎曼（Rosamund）和拉维尔斯坦。有时，叙述者胆怯地为拉杜所受到的指责做出辩护，尽管辩护很快便变得似乎越来越模棱两可和具有反讽色彩。“格里莱斯库是内伊·尤涅斯科（Nae Ionescu）的追随者，后者创建了铁卫团”，拉维尔斯坦强调道，仿佛他对大多数老于世故的美国读者根本一无所知的姓名和组织了如指掌似的。就那件事而论，读者也不会知道，内伊·尤涅斯科并未创建铁卫团。我们是否要相信，此处有些用错误信息来压制齐克的意图？这一材料中的任何一部分对于小说的整体框架而言是否具有非常大的价值？拉维尔斯坦在以其姓氏为名的小说中不是位历史学家，在他空洞的、自相矛盾的离题议论中，他撒播了好几种谬论。

事实上，作为读者，我们只能知道小说告诉我们的事，以推断各种各样的零星“事实”。我们明白，齐克喜欢拉杜，偏爱他那百科全书般的谈话，甚至偏爱他那滑入歌舞杂耍表演般的套路的高端社会滑稽剧。当拉维尔斯坦想知道“格里莱斯库到底是何种人”时，齐克告诉他：“在晚宴上，他就古代史发表宏论，他装烟斗，划很多的火柴。”这是否解决了任何有关他与铁卫团的传说中的关系或他对犹太人的感情的问题？显而易见，那一解说并非意在解决这类问题，而我们对于拉杜这个人物的理解也许最易受到他这样一个形象的影响：他紧紧抓着烟斗，“好让它不晃动，而接下来捏着（颤抖的）火柴的手指更是双倍地用力。

他不停地将不听话的烟叶塞入烟斗。当烟叶塞不进去时，他的拇指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将其压下去。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在政治上具有危险性？”

最后这个问题绝非结论性的，但它确实完美地暗示了小说读者势必拥有的种种“信息”。齐克挖苦地描写了格里莱斯库那典雅体面的举止风度：他记得每个生日、结婚纪念日以及其他情意绵绵的周年纪念日。这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事实”以及它们传达的讽刺性，都与齐克的前妻薇拉（Vela）有关，他告诉我们，她对这些细节十分敏感。但我们也明白，一个像齐克这样的美国人通常会对此种欧洲式的殷勤之举颇感怀疑，所以我们也就不会惊讶于听到他这样沉思：“我得对自己说，这是种法国—巴尔干式的荒唐举止。不知何故，我就是无法拿巴尔干的法西斯分子当回事。”这一沉思无疑并不会阻止读者拿这个法西斯分子或普遍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当回事，但事物的小说性处置要求我们，不要把《拉维尔斯坦》当作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来写的单一维度的起诉书来读。贝娄让齐克反思了犹太人是“希特勒通往权力的门票”的事实，但他又进而说：“我不认为他（格里莱斯库）是个恶毒的仇犹者。”在某些小说中，那也许是为了终止问题并转向其他内容，但贝娄至少想暗示，有更多的话要说。齐克继续想到，格里莱斯库不是恶毒的仇犹者，“但当他被要求表明态度时，他表明了态度。他有投票权，他就投了票。”

将米尔恰·伊利亚德放在所有这一切中去思考，就是在思考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行为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激发了对于格里莱斯库的描写，都不能在贝娄的描述基础之上得到充分评估。在罗马尼亚，围绕《拉维尔斯坦》展开的争论常常毫无结果，且具误导性，因为它们是基于这样一种徒劳的努力：在小说与所谓的历史记录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这部分我本人于数年前在《论小丑》这部文集的一篇长文中也有所论及。但即使没有提供对现实中的伊利亚德的描写，贝娄的小说还是使得我们去思考所有那些了然于心的现象。在关键时刻为魔鬼“说话”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正如我们心知肚明的那样，并不仅限于伊利亚德或内伊·尤涅斯科，或罗马尼亚人，或右翼极端主义。此处有更好的理由去反思传记性的、历史性的事实与小说提供给我们的“现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正如我们在贝娄这样的作家身上会期望的那样，思考为魔鬼投票的知识分子这一想法变得似乎既不可抗拒，又困难重重。正如拉维尔斯坦所言，“把一切想明白”是项“令人不快的的工作”，像齐克这样的人过着“犹太人的生活，受的是美国语言的引导，而那不是种有助于黑暗思想的语言……但那样一来，从左派领域看，或者，我实际上是在说右派领域，拉维尔斯坦督促每个人都去读塞利纳（Céline）的著作。是的，务必要读。塞利纳天赋卓著，可又疯得够呛，他在战前出版了《大屠杀琐事》

(*Bagatelles pour un massacre*) 一书。在这本小册子中，塞利纳大声疾呼要反对和告发占领并强奸了法国的犹太人……Un lupanar Juif-Bordel de Dieu (犹太人妓院——上帝的妓院)。德雷福斯案件重新被翻了出来……我同意拉维尔斯坦的说法，即塞利纳并没有假装自己不赞同希特勒的最终解决办法”。至于罗马尼亚学者：“我也不会拿游击手格里莱斯库去与右外野手塞利纳做交换。你将它放入棒球行话中时，就有可能看出这是多么疯狂。”

格里莱斯库是那种常常会滑入讽刺漫画的普通罗马尼亚(以及东欧)知识分子，因为无法轻而易举地放过他，贝娄便精明地拿他与塞利纳进行了对比，从而开启了更深入的问题，如对于一个作家在承认内疚与责任过程中的诚实的也许不相关联的思考。格里莱斯库，或就此而言的伊利亚德，在塞利纳没有假装时却进行了乔装，这真的很重要吗？毫无疑问，在贝娄小说建构的道德宇宙(假如不是在其他地方的话)中，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

我第一次见到索尔·贝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布加勒斯特，那是在一次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举办的小型官方集会上。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需要几个罗马尼亚犹太

作家来迎接这位著名的美国犹太作家。我已经通过罗马尼亚语和法语译本了解了索尔·贝娄的书籍，而且我甚至还就他的“都市世界的强大原创性”写了点儿东西，在他的都市世界中，犹太精神找到了自己新的、自由的、美国的声音，找到了其新的安宁与新的不安，找到了一种新的幽默和一种新的悲哀，最后，还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提出生活中无法解答的问题。索尔·贝娄在《系主任的十二月》中做了敏锐描绘的罗马尼亚那段时期的阴郁之气很快便在那间宽敞而优雅的官方会议室中变得明显起来。出版了《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的罗马尼亚译本的罗马尼亚出版商，带着只有他一半年纪的那种人的雀跃活力站起身，让那个古老的话题起死回生：“谁是你的后台，贝娄先生？”春日明媚的阳光立即被我们对之耳熟能详的“正午的黑暗”压制下去。听众中没有一个人会在把握那个有关罗马尼亚的被挑选出的（且必然是犹太人的）恶魔的、并非过于微妙的问题方面觉得吃力。不过，我们的嘉宾带着他那持怀疑态度的、温和的微笑，以及他那优雅的礼貌，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位讯问者的进攻。“谁给了你那个大奖，贝娄先生？谁是你的后台，索尔·贝娄？”那个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重复道。但贝娄仍旧保持着微笑和礼貌，由着性子慢吞吞地给我们讲了两个有关赢得诺贝尔奖的私下影响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位芝加哥的警察，多年来，他每天

都在贝娄所在街道的街角处问候贝娄。没有意识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已经举行过了的他像往常一样，向贝娄送上同样简单而友好的、习惯性的问候。“早上好。”“早上好。”

第二个插曲属于作家的一位高中时期的朋友，贝娄有几十年没有见过他了。在出人意料地于芝加哥的大街上与贝娄邂逅时——也是在贝娄从斯德哥尔摩返回之后——贝娄欣然地听着有关他们的校友的消息，也听着那位朋友自己的消息。最后，朋友想起要表示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还有你，索尔，你靠什么维生？你怎么挣钱？”

在令人不快的问题的穷追猛打下，优雅、热忱、超然的索尔·贝娄并未展现出他在访问期间所感觉到的不适，但他与某些罗马尼亚熟人讨论过这事。“他经受住了一种精神错乱……他相信，在大街上总有人在跟踪他，到处都有窃听器。”他的罗马尼亚翻译安托阿内塔·拉利安（Antoaneta Ralian）于2000年的《文化观察》（*Observatorul Cultural*）这本重要的罗马尼亚文化周刊上说，“当他看到，在他所住的地方，他们将枕头放在电话机上，全程都开着收音机，以便谈话不会被警察的窃听装置所记录时，他完全被震惊了。”

我与索尔·贝娄的第一次交谈不是在布加勒斯特，而是1992年在纽瓦克，那是在由《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所组织的有关东欧的作家会议上，贝娄在20世